

19.07

大埔文史

第七辑



《大埔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1988年10月

大埔文史

第七辑

yt95/35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大埔县委员会
《大埔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大埔文史》第七辑目录

人物·悼念

- | | |
|--------------------------------|---------|
| 1、缅怀罗明同志..... | 杨应彬(1) |
| 2、怀念罗明同志..... | 王德(5) |
| 3、罗明同志在百侯中学..... | 杨曾仰(10) |
| 4、赤胆忠心 激励后人——深切怀念黄芸同志
..... | 丘逸(22) |
| 5、我所知道的黄芸..... | 何永年(27) |
| 6、回忆黄世途将军..... | 黄世矩(30) |
| 7、何侠其人..... | 韩路(34) |
| 8、再世包公杨接察..... | 谢立言(38) |

史料·史话

- | | |
|-----------------------------------|-------------------|
| 9、回忆中共韩江军政干部学校
..... | 李田、廖力生、张扬、池树藩(41) |
| 10、抗日战争初期的大埔军训特别班..... | 戴礼祥(49) |
| 11、抗日期间的同仁妇女会..... | 黄志环(53) |
| 12、记南昌广益昌百货商店..... | 罗自强(57) |
| 13、百侯时代商店..... | 谢如剑、郭北岳(67) |
| 14、一九四三年石云区人民同天灾人祸作斗争
的情形..... | 梁进阶(69) |
| 15、高陂商会自卫队起义经过..... | 温秉文 邬伦兴(71) |
| 16、百侯乾隆年间的《通乡公碑》..... | 杨国石(74) |

17、太平军四度莅大埔 阳加里 (75)

民俗·风物

18、大埔客家民俗琐谈 李德礼 (78)

19、史志褒扬的大埔民风 谢 枫 (81)

20、大埔民间的祭神习俗 粤 风 (83)

✓ 21、大埔的姓氏 古幸山、黄志环、孙志雄 (86)

22、大埔民居建筑特色 李德礼 (88)

23、大埔县主要名土产 谢如剑、刘澎光 (90)

文化·艺术

24、大埔同益国乐社 何 薄、饶维真 (95)

25、由“民声剧社”发展为“广东汉剧团”前后
..... 罗恒报、罗纯生、何萍 (98)

26、罕见的民歌号子——大东的林工号子 ... 张广哲 (104)

27、邹鲁的半副对联 田辛垦 (106)

鸣 谢 (108)

补充更正 (109)

缅怀罗明同志

杨应彬

罗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他弥留之际我正好患病住医院，只能由值班护士扶着来到他的病房门口诀别，无法参加他的追悼会，也来不及写点纪念文字，一年来心中总感到不安。1935年以前我是大埔百侯中学的学生，1936年以后他长期主持侯中校务，虽未面承教诲，但对这位革命前辈我是深深地怀着敬意的。

我家乡与罗明同志的家乡相隔只有10华里，因他早年外出干革命，我不认识他，也未听过他的名字。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1936年在上海听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同志谈党史时说到的。当时我提到“罗明路线”，但并未谈到更多的东西。

1939年夏，在韶关，我去看望百侯中学董事长、当时任四战区长官部参议的杨德昭先生，他住在武江河中的一条小艇上。上艇后，我见到一位身穿蓝色制服，体格结实、满脸风霜的中年人。德昭先生介绍说：“这是罗亦平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罗明。”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举手行了个军礼。这不仅由于他是同“路线”联在一起的老前辈，而且就在不久前，我还刚刚收到在大埔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的来信，得知他在家乡艰苦深入，威信很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扛树老哥”（山区林农）。德昭还称他为军队政治工作的

前辈，要他多多教育我。罗明同志有点腼腆地说：“那里，那里，都是过去的事了。”这第一个印象已经过去近 50 年了，依然非常深刻。

1942年“南委事件”后，罗明通过杨德昭的关系，把一批进步的侯中学生转移到外地，有的还介绍到已迁到柳州的四战区长官部。我从中进一步了解到罗明主持的侯中不仅教学质量高（比如，有一年报考厦门大学的侯中学生全部以高分数录取，厦大很惊异并为此作出决定：侯中每年可免考保送几名学生入学），而且他十分娴熟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小小的百侯镇和周围乡村热火朝天，毛泽东、朱德的肖像由侯中教师、进步木刻家罗清桢等人画成巨幅壁画上了街头。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回到大埔不久，便同在闽粤赣边的地下党领导人见了面，是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他以百侯中学为阵地，团结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很尊重杨德昭，坚持由杨当校长，他自己只在实际上主持校务，以便在形势变化时好应付。这一着很有远见。果然，在“南委事件”前后，反动派把侯中作为打击对象，准备搜查时，杨德昭挺身而出，顶住逆流，使侯中没有受到损失。这一环境也很有利于掩护地下党的安全。南委受到破坏时，设在百侯的电台没有被破坏，南委主要负责同志也是先隐蔽到百侯然后转入山区的。罗明配合地下党进行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罗明到了广州。我几次去看望他，对时局交换过意见，但因交往不深，没有多谈，只感到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后来他去了南洋，我去了粤桂边区，直到解放后才在广州见面，他已任南方大学副校长。这时他的心情很愉

快，除了能为新中国培育人才外，还因为他代表南大上北京参加全国高教会议时，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热情地对他说：“罗明同志，我们欢迎你回来工作。”这时离开遵义会议已经15年了。

真正同罗明深谈是在进行粤东三县土改试点时。当时他任土改总团副团长，协助李坚真同志，我在龙川分团工作，到总团开会时有机会见面交谈。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在一次总团开会时，我到他的房里围炉夜话。我说：我入党时就听到“罗明路线”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下打开了他积郁在心头的话匣子，深沉地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关于这个历史问题，后来中央已有结论，不必说了。难得的是他一直以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的情怀和思想境界对待，以忘我的工作压下内心的痛苦，完全信任党，信任中央。他说，红军长征时，他以中央党校教育处长（校长是董老）的身份随队出发。直到遵义会议后，他奉命同其夫人谢小梅同志留在贵州，准备开辟黔川滇边区工作。这又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因为红军过境之后，国民党部队就象梳篦那样反复扫荡，一个外省人根本无法立足。加上指定与之接头的地下党人叛变，他简直连生活都无法维持，被迫在安顺城里当清洁工人，晚上住在城门洞里。他以久病之身，遭遇如此重大的危难，身体更加支持不住，只得辗转跋涉，设法回到上海，希望接上关系。没有想到在上海却被一位专门在小报上写“罗明路线”的所谓“内幕新闻”的无耻报人（他的老乡、老宗）碰上了，随即被捕。

我深深为罗明同志的坎坷经历所打动，更对他的磊落襟

怀生起尊敬之情。“三反”时，他曾被作为“老虎”嫌疑挨过斗，毛泽东听到后明确表示：“罗明会是‘老虎’？我不信！”因为罗明在苏区是以艰苦卓绝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出名的。他的“老虎”嫌疑马上被取消。接着他任省民族学院院长和民委主任，成年累月下海南、上粤北，一头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晚年，他用巨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撰写党史资料。直到最后一次住院，还带着厚厚的材料进去，甚至一边吃饭还一边用放大镜在阅读。有同志见到他这种废寝忘餐的情况，再三劝他要保重身体，注意健康。他总是笑笑，仍然想抢在时间的前头，留下珍贵史料。万万没有料到，去年4月28日由于天气反常，几阵热浪终于把这几十年来以多病之躯坚持战斗的老战士冲倒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罗明同志过去在偏西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地区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的实事求是精神将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转载自《羊城晚报》1988年4月27日第二版）

怀念罗明同志

王德

罗明同志又名罗善培，广东大埔人，年青时代就读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思想逐渐左倾，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闽南、闽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后来成为中共闽南特委、福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于党在闽南的创建和福建全省的发展壮大是有功绩的。

我认识他是在1927年1月份。那时党闽南特委第一次成立，机关设在漳州，故叫漳州特委，他任书记。罗明同志除主持特委的工作外，主要是主持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叛变后，他到闽西。1927年秋恢复漳州特委领导机关之后，我们开始有来往。省委机关搬到厦门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多起来。首先是关于程溪农民打税务所及警备队的事，我的看法获得他的支持。漳州盛产竹笋主要在南靖县属的程溪区（现已划归龙海县）。每年春笋上市时，国民党政府在这个区增设税务所和加强警备队。这儿是山区，离县城又远，除了苛捐杂税多、重之外，这些税务人员、警备队员对农民（也是笋农）任意鱼肉。1928年春笋大量上市时，农民在王占春率领下攻打税务所和警备队。适值集美的党员学生洪深，到他的朋友税务所长处游玩。攻打税务所这一天，洪深代他的朋友主持税务所工作，

他又认识王占春。群众攻打时，他指名要王占春下令撤退，王不理，继续攻打，放火烧税务所。洪深认为王占春是在打他，到省委告状。我批评他说：税务所、警备队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攻打时怎能要王占春下令撤退，这不是给群众泼冷水么！群众会怎样想，今后共产党还想在那儿领导群众么？攻打的日期早已决定，不是因你去税务所才发生的事。且你去税务所，王占春也不知道。依理你应自觉地配合群众攻打才对，你却相反，要王占春下令撤退，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的对立面，反来告状，这是你的不对。他不服，一定要找罗明同志，我转告罗明并申述了我的看法，认为这不仅是程溪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对群众的革命行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罗明认为我的意见对，予以支持，严厉地批评了洪深（此人以后下落不明）。

福建临时省委成立时，罗明同志是书记。他去参加“六大”时由陈明同志代理。在他尚未离开厦门时，陈明在漳州被捕，由陈祖康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同年6月间叛变。省委领导层对罗明意见很大，认为他指定陈祖康为代理书记不对，是用干部不当，有偏爱，不宜再任书记，认为在石码工作的刘乾初好，可以任书记，就调他来省委工作。1928年8月底中共福建省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选刘乾初为书记，罗明改任宣传部长。1929年2月刘调山东工作，罗任代理书记。1929年8月间中央派黄钊（昭）来任省委书记。黄是香港码头工人，同年12月借口回港探亲再不回来，消极不干了。又由罗明任省委书记，一直到1931年1月中旬调中央。同年5月间中央派罗明到中央苏区工

作，曾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在这期间，他提出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工作方式、方法和要求应有不同。他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却遭到当时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在中央苏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运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处分。我于1931年1月初比他早十多天离开福建调回中央工作。我们在上海虽见过几次面，但没有工作关系。以后我长期在北方，到1951年南来广东才又见面。

罗明同志的作风艰苦朴素，工作深入，经常到外地检查工作。如开“六大”回到上海时因事稍为停留，则让孟坚同志先回厦门传达“六大”精神。他在上海事毕即到福州传达。回到厦门不几天又出发到闽西传达。惠安暴动他亲自进行检查，深入基层找农民、盐民谈话，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才最后确定暴动的。闽西暴动时他虽然不在（因他去参加“六大”），但和他长期深入闽西工作是分不开的。在成立中央苏区之前闽西苏区是福建省委直接领导的。党在闽南从建立之日起就注意秘密工作，注意艰苦朴素，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成立省委后，这个作风也成为省委的领导作风。正是由于这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闽南特委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省委于1930年3月底决定打厦门监狱，并成立了破监委员会来领导，罗明兼任委员会主任。打监狱的武装由陶铸负责训练并率领攻打。到山沟里进行打靶训练时，有时罗明也参加。关于监狱打开后，打监狱的武装队伍及狱中出来的同志的行动路线，是从县政府的大门出来上船立即离开厦门还是从监狱后门出去上山（因监狱出后门就是大山），外边的同志与狱中的同志有过争论。在双方争论不休时，罗

明亲自探监，勘察地形，在他了解情况后，决定从县政府大门出来，大家努力说服了狱中同志。结果计划精密，队伍训练有素，行动迅速，领导正确，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方没有一个伤亡，轰动全国和南洋等地。这一胜利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1983年3月，从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刊物上看到他们从档案中查出福建省委于1930年7月8日关于破狱斗争给中央的报告，把这次破狱说成是“暴动的演习”。其实不是这样，3月就计划破监，怎能和立三路线拉在一起呢！且5月25日破监，到7月8日才写报告，为什么隔这么久，也是违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也令人难以理解。罗明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也感到非常惊奇，因此由他执笔写信给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说明当时破监的真实情况，澄清福建省委1930年7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符合史实的问题。这封信我也署名。1985年5月25日在厦门举行的厦门破监5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罗明和我再一次申述了我们的观点和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是他晚年又为福建党史做的一件大好事。

立三路线的指示到达福建后，省委成员中多数表示热烈的拥护，但罗明、黄剑津和我表示怀疑。在讨论中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城市暴动么？福建没有条件，不能做暴动部署。二，中央苏区红军打东江也不对，广东敌人力最大，不应再去打，应从漳州方面发展，这儿敌人的力量较弱。这个意见，从1929年冬以来就提过好几次。三，党、团、工会合并不对，既削弱青年工作的力量，又混乱了党的组织。最后决定成立行委。并将这三点不同意见报告中

央。从1980年以来，罗明和我在谈福建党史时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83年我从《平和暴动史料》中看到转载当年省委这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把三个问题说成只有一个问题，即只讲青年团是否取消这个问题。在破除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又提到对立三路线有分歧的问题，罗明也当场声明：“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30年8月15日，我看到了，但不是我批发的。”罗明这样澄清事实，是对革命抱有高度的责任感，是件好事。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工作表现都很好。

谈上述这些问题，不能全部概括罗明在福建工作的全部情况，只是扼要地说些问题。人是没有完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罗明也有缺点，但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在福建的功绩是令人怀念的！他的工作作风和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转载自《南方日报》1988年4月28日第二版）

罗明同志在百侯中学

杨曾仰

我县杰出的并为全县人民尊敬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同志，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他那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他身处逆境，屡受委屈而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革命品质，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形象是那么高大而坚毅，又是那么诚信而和蔼可亲！

我有幸从1936年冬至1942年秋，先后七年在他主长的百侯中学（以下简称侯中）担任农场主任兼生物学教师，罗明同志以身作则，平易近人，谆谆善诱和作风民主，把全校二三十位教职员和三百多学生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进行艰苦而灵活的斗争，使侯中被誉为“赤化学校”，百侯亦被目为“小延安”。全校师生既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中，又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崇高信念而努力教和学，使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文化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如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八名报考厦门大学，全部以优良成绩被录取，引起厦大的重视，并专函

通知，请侯中每年保送四名学生免试入学。从此，侯中形成了一个革命的优良的传统，既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又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罗明同志这一功绩，将永远鼓舞侯中全体师生和浦东人民革命和学习的热情，而他当时在侯中实施的“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的理论和实践，到现在仍有其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由于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当然无法写出像样的东西来，衷心期待同志们，特别是身受罗明同志亲身教导的侯中校友们，多加补充和斧正！

—

1936年秋，罗明同志（当时改名为罗亦平，我们都尊称他为亦平先生）被聘为侯中考核股长（相当于当时的训育主任），1937年秋，接任代校长（校长由当时侯中的董事长杨德昭先生挂名）。在他全面主持校政的时候，正是日寇入侵，东北沦陷，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与积极响应；蒋介石政权被迫暂时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罗明同志秘密与张鼎丞、方方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萧明同志取得联系，并在教师中共党小组和学生党支部的支持下，根据中国共产党当时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结合战时大埔农村的实际，

和“生活教育”在侯中实践三年来的优良传统和改革的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利用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战时教育的各项规定作为掩护，制定并提出了百侯中学实施“抗日救国教育”的五项教学方针：

- (一) 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抗战思想；
- (二) 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
- (三) 锻炼学生的坚强体魄；
- (四) 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艰苦奋斗作风；
- (五) 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生产与战备技能。

为实施这些教学方针，他认真物色进步教师和细心培养后进教师，并首先按国统区教育部的规定，配备好领导班子：丘晋畴先生为教务主任，梁耀南先生（中共党员）为训育主任，杨超敏先生为总务主任，杨曾仰先生为农场主任，杨达仁先生为文牍主任。他更利用校内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大大小会，根据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形势的特点，努力激发师生抗日救国的热情和教学的积极性。对学校内各领导成员更经常进行既令人心情激动，又非常愉快，既尊重而又令人信服的个人交谈。例如对我这个刚离开城市大学校门，无论在政治上、社会经验和教学经验都非常幼稚的青年教师，他总是经常前来问寒问暖。“你回到乡下来，生活能习惯吗？”“在侯中你的工资比你当助教的工资少了一些，你有什么意见？我们要看到四周的劳苦大众，他们连粥饭也吃不饱呵！我们的工资比他们的收入多好几倍呀！”“你把农场筹办得很快，很好！你的任务却很重。你一方面要带领全校同学到农场去参加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而每周还要上12

小时的动植物课，现在是抗战时期，前方打仗，后方要抓紧农业生产，你上植物、动物课时，一定要把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养猪、养鸡鸭的科学技术结合进去，理论结合实际，才能取得真正的教学成果。”“我对农业科学技术是门外汉，完全不懂。但我有个建议，今后农场要进行两项试验：一是如何选出水稻和甘薯的优良品种，以便推广，使我区、我县的粮食能得到增产。一是进行果树上山试验，我县是山县，山地有的是，如果宜种果的山地都种起果来，农民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呀！请你认真考虑一下。”像这样的谈心不知有多少次，他不断鼓舞我的抗日救国的热情，使我明确办好农场的任务，改进了上动植物课的教学方法。这种充满信任、热情鼓舞、诚恳帮助、关心同事们的生活和进步的领导方式方法，使人信服地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实施“抗日救国教育”的教学方针，步伐一致地，努力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罗明同志在全校师生中，更大力推行广泛的民主，在各种会议上，热诚的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使校内民主空气非常浓厚，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从而促使学校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计划方案等日臻完善，大家更自觉地遵守；每学期编订的校历和每周的中心活动，也更有领导有成效地贯彻完成。当时，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教学的热情却空前高涨。

罗明同志特别强调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做中教，着重实践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说服教育。对犯错误的学生“扬善救失”，从不轻易处罚。如经常对犯错误的学生作个别谈话，直至学生